

## 一、中國留學生的東渡

1896 年（光緒二十二年、明治二十九年）舊曆三月底，清朝首次遣派學生 13 人抵達日本，他們是：唐寶鐸、朱忠光、胡宗瀛、戢翼翬、呂烈輝、呂烈煌、馮聞謨、金維新、劉麟、韓壽南、李清澄、王某和趙某。這一批學生都是經過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選拔試而獲派留學日本的，年齡從 18 歲到 32 歲不等。當時的駐日公使裕庚原把這 13 名學生的教育委諸日本外務大臣西園寺公望，但西園寺氏因兼任文部大臣，故轉請高等師範學校校長嘉納治五郎負起教育這批學生的全責。

此後，中國留學生人數逐漸增加，1899 年增至 200 名，1902 年達四五百名，1903 年有 1,000 名，到了 1906 年，有謂竟達一兩萬名之多。據筆者研究的結果，1906 年留日學生實數約為 8,000 名左右；即使如此，一個國家一下子送出 8,000 名留學生，而另一個國家一下子接受 8,000 名留學生，這種情況，歷史上恐怕不多見吧？

中國一直是日本人前往留學的國家。由公元七世紀開始，日本留學生便冒生命危險從海路負笈中國，即使在鎌倉時代（1185-1333），留學僧亦絡繹不絕。千多年來，日本不斷從中國學習哲學、文學、制度乃至日常的生活習俗。總之，過去日本是送出留學生的國家，而中國是接受留學生的國家。

現在形勢逆轉，昔日接受留學生的國家變成了送出留學生的國家。當時日本的報紙雜誌雖並未把這 13 名中國學生留日之事，當作英雄凱旋或台灣抗日之類的熱門新聞去報導；但是對於日本有識之士來說，這當是一件值得驚喜的事。備受青年愛戴的文學家大町桂月，在《太陽》（1902 年 11 月 5 日號）「時事評論」（教育）欄寫道：

中國的急務在發展教育，而教育上的急務在派遣海外留學生；近年派遣

學生來向昔日的弟子問道求益，真不愧大國風度。

文部省專門學務局長兼東京帝國大學教授上田萬年，在《太陽》（1898年8月20日號）發表長文〈關於清朝留學生〉，說：

中國這個衰老帝國，過去昏昏欲睡，奄奄一息，自從甲午一役以來，益為世界列強欺凌所苦，如今覺醒過來，漸知排外守舊主義之非，朝野上下，奮發圖強，廣設學校，大辦報紙雜誌，改革制度，登用人材，欲以此早日完成中興大業，今日清朝派遣留學生來我國，最先雖或因我國公使領事勸誘所致，然實亦氣運所使然。……清朝於四五年前，仍對我輕侮厭惡，今一朝反省，則對我敬禮有加，且以其人材委託我國教育，我國應如何覺悟反省一己之重任？……

大町與上田兩人的意見，大抵能夠反映日本人士對此事的最初反應。

## 二、中國人對西洋文化的反應

日本有識人士且驚且喜地問：為甚麼過去的留學生派遣國——日本，會變成留學生教育國，而留學生教育國——中國，卻變成留學生派遣國呢？

一言以蔽之，因為在吸收近代文化上，日本比中國來得快。那麼，為甚麼會這樣呢？要明確地解答這一問題，首先必須明白西洋與中國及西洋與日本之間的關係。

中國是個文化悠久的國家，不但孕育了卓越的哲學和文學，而且是印刷術、指南針，火藥、穹窿建築等重大發明的發祥地。當中國強盛之時，西洋人因

為仰慕中國文化，不遠千里而來，而中國則以撫慰朝貢國的態度來接待他們。

到了十六世紀，西洋人大抵已從海路抵達中國，而且更進一步來到日本。葡萄牙人於1516年抵廣東，1543年抵日本種子島；西班牙人則於1575年到中國，1584年到日本。

西班牙傳教士方濟各（Francis Xavier）於1549年抵日本傳教之後，就覺得既然日本文化全部來自中國，日本人極為崇尚中國，倘使日本文化的發祥地——中國，也信奉基督教的話，日本亦必步其後塵。因此，他便離開日本，不辭艱苦，打算進入中國，但終未能如願以償，在1551年病死於上川島。這個故事，在日本家傳戶曉。不論在經濟上或思想上，西洋人都以中國為目的，日本並不怎麼重要。

十六世紀初期，最先抵達中國的西洋人是商人和外交官。不久，耶穌會傳教士也來了，著名的有利瑪竇（Matteo Ricci）、龍華民（Niccolo Longobardi）、湯若望（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）、南懷仁（F. Verbiest）等人。根據王韜《泰西著述考》，由1552年至1674年，僅屬「著名」的教士便有92人，而他們多數埋骨於中國。他們用漢文介紹西洋知識的著作竟達211種之多。以利瑪竇為例，漢文著作有《天主實義》、《畸人十篇》、《幾何原本》、《測量法義》、《萬國輿圖》、《乾坤體義》等，大抵以宗教和理科書籍為主。

不過，針對拜祀孔子和祖先的問題，教士與教士之間發生了爭論，康熙皇帝在1720年頒下禁教命令。以後百餘年間，教士再不能在中國活動。

到了十九世紀，基督教教士復來中國。最早的是英國人馬里遜（Robert Morrison）。他不但用中文翻譯《聖經》，而且在1815年發刊漢文期刊《察世俗每月統記傳》（*Chinese Monthly Magazine*）。這本刊物不能在中國國內出版，不得已改在馬六甲發行，目的在啟導南洋華僑和中國國內人士。1833年，別的傳教士在廣州創刊《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》月刊。其後又有《遐邇貫珍》（1853）、《中外新報》（1854）等漢文報章雜誌相繼刊行。

1877年各教會合辦的益智會成立，發行教科書《西學初步》42部80冊。

又，韋廉臣（Alex Williamson）為了向中國人普及西洋知識，使能發奮圖強，振興國家，組織了廣學會（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Christian and General Knowledge Among the Chinese），出版了 250 部漢文專書和譯本。

總之，十六世紀以來，傳教士雖然不斷引進近代西方文化，但是，當時的中國人卻無接受之意。傳教士費煞苦心用漢文寫成的東西，大多數中國人亦不加理睬。

### 三、日本人對西洋文化的反應

日本方面的態度又如何呢？

自 1639 年（崇禎十二年、寬永十六年）以來，日本實行鎖國政策，除中國及荷蘭以外，禁絕與其他國家通商，僅在長崎一地設立特定通商口岸，連擔任翻譯的「通事」，說說荷蘭語是可以的，但不准閱讀荷蘭文的書籍。

不過，日本人中間，不惜以身試法而立志追求西洋學問的比比皆是。渡邊華山、高野長英等人，甚至因此而斷送了性命。<sup>1</sup>

1720 年（康熙五十九年、享保五年），因為吉宗將軍的英明果斷，除宗教書之外，其他洋書獲得解禁，洋學又再興盛起來。利瑪竇的《乾坤體義》、《圖容較義》、《經天說》等書，首先從中國傳來，為日本人所熱心閱讀。這是利瑪竇死後 110 周年的事。此外，漢文翻譯西洋數學的書，例如《職方文算》、《測

1 譯者注：高野長英（1805-1850），幕末蘭學者、蘭醫。早年以翻譯西洋生理學《醫原樞要》一書，名聲大噪。與小關三英、渡邊華山、鈴木春山等人組織尚齒會，研究西洋事情。1838 年著《夢物語》，暢論海外形勢，反對幕府驅逐英船來航，堅決主張開國，被捕下獄。其後屢為幕府所迫，自殺而死。渡邊華山（1793-1841），幕末蘭學者、畫家。對幕府的鎖國政策深表不滿，曾著《憤機論》予以嚴評。1839 年因蠻社之獄牽連被捕，於獄中自殺。

量法義》、《曆算全書》、《數理精蘊》等亦相繼輸入。<sup>2</sup>

1850 年代，日本大量出版漢譯洋書的訓點<sup>3</sup>本或日文譯本。英國人合信（Dr. Benjamin Hobson）的醫學書《全體新論》於 1850 年在中國發刊，1857 年被伏見醫生越智氏在日本翻印。此後，這本書在日本一共翻印了十次之多。美國丁韞良（W. A. P. Martin）著《萬國公法》的漢譯本，於 1864 年（同治三年、元治元年）在中國出版，第二年（1865）便被日本開成所翻印。這本書先後在日本翻印過五次，到了明治時期成為法學教科書。在幕末時代，這類漢譯的翻印本，為數實在不少。

西洋人出版各種洋書的漢譯本，目的是向中國人灌輸近代文化。但是，新文化的種子在中國被埋沒了，到了日本才發芽、開花。

日本人並不滿足於西洋人為中國人而譯的近代知識書籍，開始自己動手翻譯荷蘭書籍。《蘭學事始》一書，就記錄了關於前野良澤、杉田玄白等人非常感人的事蹟。<sup>4</sup>

前野、杉田等人為了翻譯《解體新書》，克服重重困難，花費不少心血，工作了四年，易稿 11 次，結果於 1774 年（乾隆三十九年、安永二年）出版了譯本。

在日本熱心洋學的不僅是民間學者。德川幕府於 1855 年（咸豐五年、安政二年）設立「洋學所」翻譯外國書籍及教授荷蘭語文。洋學所後來改名「蕃書調所」、「洋書調所」、「開成所」等，成為東京大學前身。

1861 年至 1863 年間，洋書調所翻印下列西洋人為中國人發行的漢文報紙及雜誌：《官報·中外新報》（美國傳教士於 1858 年在寧波發刊）、《官報·六

2 據吳秀三：〈洋學的發展と明治維新〉一文，載史學會編：《明治維新史研究》，頁 352、365。

3 譯者注：為了訓讀漢文，注在漢文旁邊的假名和標點，稱為訓點。

4 譯者注：《蘭學事始》原名《蘭東事始》，幕末醫學者杉田玄白（1733-1817）所作。該書記敘杉田、前野良澤、中川淳庵三人於 1771 年起翻譯荷蘭語人體解剖書籍等的經過，兼述德川時代洋學發孕期的情況，是瞭解「蘭學」的重要文獻。有關杉田等人翻譯《解體新書》的經過，參看呂鳳愛節譯：《蘭東事始》，載《香港留日學友會年刊》第 5 期（1979 年）。

合叢談》（聖公會的偉烈亞力〔Alexander Wylie〕在 1857 年至 1858 年於上海發刊）、《官報·香港新聞》（香港英文報紙 *Daily Press* 的漢文版）、《官報·中外雜誌》（英國傳教士麥嘉湖〔John Macgowan〕於 1862 年在上海發刊）。<sup>5</sup>

## 四、中日近代化的差別

由於中國人既漠視西洋人漢譯的近代文化書籍，故更不會進而譯印西洋書籍。第一本由中國人自己譯刊的西洋書籍是 1847 年（道光二十七年）魏源的《海國圖志》，但已比日本的《解體新書》遲出了 74 年。

如前所述，中國最早的漢文期刊是 1815 年（嘉慶二十年）由西洋人發刊的《察世俗每月統記傳》。此後，由西洋人發刊的漢文報紙期刊共有 17 種之多。例如《特選撮要》（*Monthly Magazine*）、《天下新聞》（*Universal Gazette*）等是。<sup>6</sup>

不過，由於中國人對這類東西漠不關心，所以，就沒有及早發刊自辦報紙和雜誌的打算。反之，在日本，卻由政府帶頭翻譯或翻印外國的報紙和雜誌，故很早就有自辦的報紙和雜誌的雛型。

在日本並不是沒有西洋人經營的報紙，例如 1867 年（同治六年、慶應三年）的《萬國新聞紙》。然而，在此之前已有由日本人主辦的報紙，例如 1863 年（同治二年、文久三年）發刊的手抄本《橫濱新聞》。踏入 1868 年，由於明治維新政局的刺激，西部有《各國新聞紙》、《內外新聞》等，東部則有《中外新聞》、《日日新聞》、《江湖新聞》等，一年之間，竟發行有 20 種由日本人自

己經營的報紙。

與此同時，在中國國內由中國人經營的報紙一份也沒有。中國人自己主辦的報紙，以 1873 年的《昭文新報》為最早。在中國，由西洋人發刊的期刊比西洋人在日本發刊的時間早 50 年以上，但中國人自己經營的卻比日本人在本國經營的遲了六年。

由本國人發行雜誌，日本亦遠較中國為早。柳川春三的《西洋雜誌》於 1867 年創刊。配合自由民權運動，日文雜誌接踵湧現。在明治二十年代（1887-1896），《反省會雜誌》（《中央公論》前身）以及成為歐化主義急先鋒的《國民之友》之類的大型雜誌，為數不少。在同時的中國，一本雜誌也沒有。中國人主辦的雜誌，以 1896 年（光緒二十二年）由梁啟超任主筆的《時務報》為最早，比日本的《西洋雜誌》遲了 29 年。

雖然對於引進近代文化，中國人比日本人方便得多，但他們對此事卻不關心。日本的條件較中國惡劣，但卻熱心從事，故在近代化事業上比中國捷足先登。為了避免分述的麻煩，請看下列兩國近代化比較表。（見下表）

在比較表上年差甚微的事項，在質素上卻有很大的區別。例如，設立外語學校，在日本是自發的，在中國卻是 1858 年（咸豐八年）《天津條約》之後，受英法兩國壓迫而設立的。多數中國知識分子只承認儒學為學問，並不踴躍進入教授外國語和自然科學的同文館，而日本知識分子的態度恰好相反。

5 據小野秀雄：〈我國初期的新聞及其文獻について〉一文，收入《明治文化全集》第 4 卷（東京：日本評論社，1968 年），頁 2-20。

6 詳參戈公振：《中國報學史》（香港：太平書局，1964 年）；實藤惠秀：〈中國雜誌の概観〉，收入《日本文化の支那への影響》（東京：雲雪書院，1940 年）。

| 類似事項   | 日本        |      | 中國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| 年差   |
|--------|-----------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|------|
|        | 事項        | 年    | 事項                  | 年    |      |
| 外語學校   | 洋學所       | 1855 | 同文館                 | 1862 | 7    |
| 購買輪船   | 咸海丸       | 1857 | 購入商船亞丁號 (Aden)      | 1872 | 15   |
| 留學     | 荷蘭留學      | 1862 | 美國留學                | 1872 | 10   |
| 工廠     | 橫須賀造船所    | 1864 | 安慶軍械所               | 1861 | (-3) |
| 文字改革運動 | 《漢字御廢止之儀》 | 1866 | 《一目了然初階》            | 1892 | 26   |
| 雜誌     | 《西洋雜誌》    | 1867 | 《時務報》               | 1896 | 29   |
| 詔令     | 五條誓文      | 1868 | 科舉廢止詔書 <sup>7</sup> | 1905 | 37   |
| 報紙     | 《中外新聞》    | 1868 | 《昭文新報》              | 1873 | 5    |
| 電信     | 東京—橫濱間    | 1869 | 上海—香港間              | 1871 | 2    |
| 貨幣制度   | 新貨幣制度     | 1871 | 實行法幣                | 1935 | 64   |
| 髮式     | 自由放髮      | 1871 | 自由剪髮                | 1911 | 40   |
| 火車     | 東京—橫濱間    | 1872 | 上海—吳淞間              | 1876 | 4    |
| 新曆     | 太陽曆       | 1873 | 太陽曆                 | 1912 | 39   |
| 民眾政治運動 | 民選議院設立建議  | 1874 | 公車上書                | 1895 | 21   |
| 國立新式大學 | 東京大學      | 1877 | 京師大學堂               | 1902 | 25   |
| 立憲預告   | 國會設立詔書    | 1881 | 預備立憲上諭              | 1906 | 25   |
| 頒布憲法   | 大日本帝國憲法   | 1889 | 中華民國憲法 <sup>8</sup> | 1947 | 58   |

<sup>7</sup> 譯者注：似應以 1898 年清廷下詔變法的詔書來類比。

<sup>8</sup> 譯者注：中國最早一部憲法是 1912 年頒布的《中華民國臨時約法》。

對留學的態度也是一樣。幕府正式派遣留學生到荷蘭雖是 1862 年（同治元年、文久二年）的事。不過，在八年之前，吉田松陰便曾冒着生命危險企圖乘搭美國船隻出國留學，因而被捕入獄。<sup>9</sup> 日本最早前往荷蘭的留學生，也是抱必死的決心和志願出國留學的。

1860 年（咸豐十年、萬延元年），日本向美國訂購兩艘軍艦，同時計劃學習其海軍軍事學及造船學。這時，蕃書調所助教西周和津田真道，決心加入留學生行列，於是拜謁遣美使節候選人之一的永井玄所長。見面時，永井一眼便看破來客心思，在二人開口之前，說道：「足下想是為赴美的事而來吧！」<sup>10</sup> 可見二人真誠留學之情已溢於言表。

留學美國的事因美國南北戰爭而中止。翌年，幕府計劃派遣使節赴歐美，西周氏向下野守竹內氏呈遞留學志願書。下野守答道：「足下之申請將予鄭重考慮，惟志願人數甚多，吾等未知如何應付耳。」<sup>11</sup> 由此可見日本的知識分子大多數都希望出國留學。

中國人留學美國，是上述事件十年之後的事。那是因美國傳教士的關係，在美苦學而畢業於耶魯大學的容闈，向曾國藩請求的結果。按照容闈的留學計劃，選取 12 歲到 15 歲的少年 120 人；分成四批，每年派遣 30 人，每人留學 15 年。

初時，在廣土眾民的中國，竟然無法選拔足夠人數，容闈不得不親赴香港，在英國人所辦學校的中國學生中挑選，好不容易才湊足人數。<sup>12</sup>

對於鋪設電線，最初日本人也不太樂意，亦有不愉快事件發生。但中國人

<sup>9</sup> 譯者注：吉田松陰（1830-1859），長州藩士，幕末的勤王志士。1853 年，美國海軍提督培理率艦隊赴日叩關，日本全國騷然，吉田主張攘夷。翌年，美艦隊又再叩關，停泊於下田，吉田與洋學者佐久間象山密謀乘搭美艦出國視察，事發繫獄。後於獄中設松下村塾，熱心教育子弟，鼓吹尊皇攘夷精神，1858 年被處死。其弟子高杉晉作、木戶孝允、久坂玄瑞等，多成為倒幕派和明治維新的重要領導人。

<sup>10</sup> 津田道治編著：《津田真道》（東京：東京閣，1940 年），頁 5。

<sup>11</sup> 同上，頁 16。

<sup>12</sup> 參看容闈：《西學東漸記》（上海：商務印書館，1934 年），頁 108-110。

持的是反對的態度，其強烈程度遠比日本人厲害。

1865 年（同治四年），英國人萊奴特（Reynolds）在上海吳淞之間鋪設了電線，不久便被中國人拆除。1871 年（同治十年），大北電報局在香港—上海間鋪設海底電線，在上海附近陸地部分的鋪設是秘密進行的，未被中國人發現，工程才得順利完成。<sup>13</sup>

在中國敷設鐵路也不是容易的事。1863 年（同治二年），27 名上海英國商人擬向李鴻章請求敷設上海—蘇州間的鐵路，並未獲准。1875 年（光緒元年）8 月，英人獲得敷設上海吳淞間鐵路權，翌年 6 月通車。1877 年 3 月，火車輾斃一個中國士兵。蘇淞太道馮駿光與英國領事交涉，要求立刻禁止火車運行，英領事不加理會。跟着，南洋大臣沈葆楨也向英領事交涉，亦無結果，最後，李鴻章與英國公使威妥瑪（Thomas Wade）談判，以 28.5 萬兩白銀買下鐵路，命人拆除路軌，原擬把鐵路器材運往台灣，因缺乏運費而作罷，結果把所有器材沉入打狗湖底。<sup>14</sup>

## 五、從思想上看中國近代化落後的原因

西洋人到中國比到日本為早，對於引入西洋文化，中國亦比日本有利，為甚麼中國在近代化事業上反比日本落後呢？探其原因，中國人恒認為中國具有卓越文化，西洋人亦因此而來中國，故不賞識西洋的近代化。

「中國」這名詞的含義是：中國是世界中心，文化本源，故中國稱為「上國」，其朝廷稱為「天朝」。日本直到江戶時代（1603-1867），也還是這樣尊

13 參看張星娘：《歐化東漸史》（上海：商務印書館，1934 年），頁 92。

14 同上，頁 88。

稱中國的。

中國的君主「以家為天下」，是世界之主。漢族以外的人士，一旦成為中國皇帝，亦承受這種意識。元世祖信任馬可波羅，該是一種變例。明神宗封利瑪竇及清聖祖封湯若望，只是愛惜其「技藝」，並非站在人類平等立場上予以禮遇。准許西洋人來中國貿易，亦以彼等為「朝貢國」，憐其生計，給予必需品（貿易品），也無非是以天地之心為心，施惠給遠人而已。

1653 年（順治十年），見到滿洲人在中原已確立權力，為了獲得貿易許可，荷蘭人杯突高醫（Peter de Goyer）及惹諾皆色（Jacob de Ceyser）以使節身份到北京。他們抵達後，中國方面要求他們行「三跪九叩」之禮，他們答應之後，始獲准謁見清帝。此後每年都被接見，可是並未獲得貿易許可。

1665 年（康熙四年），荷蘭再派范哈倫（Van Horn）到北京，亦行三跪九叩之禮而獲接見，可是始終不能獲得通商特權。

1793 年（乾隆五十八年），英國使節馬戛爾尼（Lord Macartney）到北京交涉通商事宜。座駕船沿白河逆流而上的時候，打出「貢使」旗號。抵北京時，皇帝行幸熱河，他也到熱河去，謁見時清廷要求他行三跪九叩之禮。這位使節因英國正進行產業革命，是世界最強的國家，而且自己又是英皇佐治三世陛下的代表，不允行這種卑屈禮儀，於是嚴詞拒絕。經過一番交涉之後，雙方妥協：必須以英王臣下謁見英王的禮儀去謁見清帝。謁見之後返北京，正要交涉通商問題，英使便被迫立刻離開北京，無功而返。

1816 年，英國又派阿美士德（Lord Amherst）到北京，由於拒絕行三跪九叩之禮，未獲清帝接見，並且即日便須離京，不能從事任何交涉。

後來，中英間發生鴉片戰爭，1842 年（道光二十二年）兩國締結了《南京條約》，雖然其中條文已經訂明中英雙方應以平等地位相待，可是中國人仍然常常輕視西洋人為「夷狄蠻人」。

1856 年，中國因亞羅號事件與英法聯軍開戰，1858 年戰敗後，簽訂了《天津條約》，條約中亦有一條款規定「凡歐洲人不得稱之為蠻夷」。不過，中國人

仍然不改變其態度。這就是誇耀本國優越的中華思想。

中國自滿自大的原因，固與「地大物博」這個地理因素有關。但是尚有更大的根本的原因：即文化問題，或思想問題，亦即儒家思想問題。

人們相信中國擁有無與倫比的優越文化，亦即擁有誇耀世界的儒教（聖人之道）。聖人之道是天經地義的、萬世不變的。這不但沒有絲毫不足之處，也沒有絲毫多餘的地方，它盡善盡美，貫通今古，放諸四海而皆準。

只要行乎聖人之道，不管任何國家，任何時刻，都可推行治道。所謂教育，就是使學生記誦這聖人之道。由於它已兼備萬物，故不必創造和發展，只須記誦熟習就夠了。注重背誦默記的教育因而誕生，官吏就是信奉儒教而協助皇帝統治的人。因此，選拔官吏的科舉考試便以五經為中心。文學亦須「文以載道」，載的是儒家之道。儒教成為政治、學問、教育的中心，連風俗習慣都濡染了儒教色彩。

因此，近代文化不容易進入中國。既以儒教為滿足，就再無必要輸入夷狄的東西。與固有文化相比，近代思想文化，只不過是形而下的東西；至於火車電信之類的東西，就更等而下之了。中國人認為「火車非聖人所乘，電信亦非聖人所用」，總之，不必細顧可也。

1884年（明治十七年），日本漢學者岡千仞遊歷中國各地，在慈谿探訪曾旅日的王忞園的族人，獲得熱誠款待。族人中有王硯雲這個舉人，廣有才學，能言善辯。王氏說：「李中堂（鴻章）開辦招商、機器二局，耗資百萬，消耗國力，並無結果，大失民心。」岡千仞不以為然，指出中國人是中了儒教的毒；還解釋說，取西洋之所長，以供我用，就是養育國本之道，硯雲卻憤然說道：「機器者聖人不語者也。此物唯有導國人去其質樸而趨赴機巧。」從硯雲的一番話，可以窺見，若有人引進西洋文化，便會被斥罵為「名教罪人、士林敗類」。

## 六、中國思想的變化與留學日本

十八世紀後半期，英國向中國輸入鴉片的數量，逐年增多。進步的士大夫，不但主張禁煙，而且主張學習外國之所長以保衛中國。龔自珍（1792-1841）與林則徐、魏源等人，便主張嚴禁鴉片，並學習製造西洋機器（「西洋奇器」），講求富國強兵。

實行禁煙的林則徐（1785-1850），認為必須與販賣鴉片的國家絕交，但主張應與要求正當貿易的國家通商。因此他積極地倡導國人瞭解外國實情，向侵略者學習新式武器，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。為此，中國先要振興新式軍需工業，開發礦藏。可惜，這些建議未獲朝廷認可。

魏源（1794-1852）翻譯了《海國圖志》，也是為了知悉外國事情，學習外人所長，使中國富強。他在《海國圖志》（1842）的〈籌海篇〉中說：

古之聖人……射御登諸六藝。豈火輪火器不等於射御乎……今西洋器械，借風力水力火力奪造化，通神明……因其所長而用之，即因其所長而制之。<sup>15</sup>

1842年，中國在鴉片戰爭戰敗，被迫簽訂不平等條約。隨後，在1860年（咸豐十年），英法聯軍攻入北京，皇帝逃到熱河，清朝君臣更受到重大的打擊，加上清廷平定太平天國時曾借助西洋人的力量。因此，清廷統治者心裏雖然鄙視西洋人為「洋夷」，但也感到弓箭的確無法與西洋武器相比。

1862年，曾國藩在安慶設造船廠，李鴻章在上海設製炮局；1864年（同

15 魏源：〈籌海篇三·議戰〉，《海國圖志》卷二，頁45。

治三年），李鴻章又在蘇州設西洋炮局，翌年收購西洋人在上海經營的大工廠，創辦江南製造局，製造槍炮軍艦；1866年（同治五年），左宗棠在福建設船政局——這是海軍基地兼海軍軍需廠；1867年（同治六年），崇厚在天津設機器製造局，李鴻章在南京設金陵機器局；1877年（光緒三年），丁寶楨在成都設機器局；1878年（光緒四年），左宗棠在蘭州設機器織呢廠；1881年（光緒七年），吳大澂在吉林設機器局。

為了支援軍器的製造，清廷漸次採掘礦藏，敷設電信與鐵路。配合武器的製造，清廷亦紛紛建立新式海陸軍學校。海軍學校有福建船政學堂（1866）及天津水師學堂（1881），陸軍學校有天津武備學堂（1885）及湖北武備學堂等，而海陸軍學校則有廣東水陸師學堂（1887）。

主持建立這種新式武器及設施的官僚稱為「洋務派」，他們這一運動叫做「洋務運動」。但是大部分官僚和一般的知識分子都是頑固保守的封建主義者，他們猛烈地反對洋務運動。其反對的理由，總是指別人背叛聖人之道。

當時，來自西洋的學問，例如天文學、物理學、數學等，被稱為「聲光電化之學」或「西學」。以西學為基礎所製造的機器，被視為「機巧」小術，是「不足以語聖人之道，玷污聖人之道」的。

支持洋務論的人，通常抬出西學源出中國說——「西學源於中國，機器亦源於中國」，以為辯解，羅江荷笠者的《瀛海論》<sup>16</sup>大概是其先驅吧！

黃遵憲《日本雜事詩》（1879）的〈學校〉自注、王之春《蠡測危言》（1885）的〈廣學校〉、湯震《危言》（1890）的〈中學〉，以及陳熾為鄭觀應《盛世危言》所寫的〈序〉（1893），全都大同小異，都是西學源出中國說的調子。張之洞《勸學篇》（1898）的〈會通〉篇，甚至在中國經典中尋求西學淵源，張氏不再滿足於光是引用緯書及諸子，而全引經書，其主張與《瀛海論》同出一轍。「中學為

16 譯者注：原著曾詳引《瀛海論》一段文字，譯者略嫌其說法多牽強附會，故特刪去不譯。

體、西學為用」之說遂興。

中體西用說的產生，最先似是出於馮桂芬在1861年所寫的《校邠廬抗議》，其文有謂：

如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，輔以諸國富強之術，不更善之善者哉。<sup>17</sup>

薛福成以「中學」為「道」，西學為「法」，王韜則以「中學」為「道」，西學為「器」，但意趣則一。

1896年孫家鼐在〈議覆開辦京師大學堂摺〉中，首次使用「中學為體、西學為用」之語。他說：「以中學為主，西學為輔。以中學為體，西學為用。」張之洞《勸學篇》的〈會通〉篇，亦謂：「中學為內學，西學為外學。中學治身心，西學應世事。」

「中學為體，西學為用」一說，雖然有人以為是張之洞提倡的結果，其實在當時，這種說法早已流行，張氏不過大聲疾呼而已。

其實「西學源於中國」說也好，「中學為體西學為用」說也好，都表露了儒家學說的完全性已有了破綻，並顯示出中國已從天朝上國的睡夢中驚醒過來。西洋的文明即使源出中國，但卻由西洋人去發展，中國今日不得不把它學回來。不論怎樣自吹自擂，說甚麼中國之學為本、為道、為體，而西洋之學為輔、為法、為器、為用；說甚麼中國人為主人，西洋為僕人，今天卻不得不學習此僕人的文化。

於是，引進近代文化的心態才逐漸形成，成為留學外國的思想的根據。

17 馮桂芬：〈采西學議〉，《校邠廬抗議》（1860年刊），頁69。

## 七、留學日本的理由

瞭解了中國思想的變化，我們便可以討論留學這件事。那麼，為甚麼大量學生到日本去留學呢？

在 1894 年至 1895 年的甲午之戰，日本打敗了中國。中國人以為日本的勝利，乃因普及教育和實行法治有成所致。因此戰後第二年，中國立刻派遣 13 名留學生到日本。

日本人因中國學生留學日本，難免會提出如下問題：日本的新式教育或新式法律，都從西洋學來，中國人為甚麼不到這種新文化的本家——西洋——留學而來日本呢？

上面提過的大町桂月在「時事評論」欄寫道：

從費用觀之，留學日本比較便宜；但直接從本家所得者，當遠較經重譯得來之學問為正確者也。

不過，中國當時不作此想。中國在近代化方面大為落後，必須急起直追。向去蕪存菁的日本學習，比直接向本家學習，實在簡便而有利得多。張之洞在《勸學篇》說：「西書甚繁，凡西學不切要者，東人已刪節而酌改之。」<sup>18</sup>又謂：「我取徑於東洋，力省效速。」<sup>19</sup>

其次尚有語言文字問題。中日兩國都使用漢字，所謂「同文」之國。張之洞在《勸學篇》謂「東文近於中文，易通曉」，<sup>20</sup>梁啟超〈論譯書〉舉出學習日文較

易的五個理由：

- (一) 音少；
- (二) 音皆中之所有，無棘刺扞格之音；
- (三) 文法疏闊；
- (四) 名物象事，多與中土相同；
- (五) 漢文居十六七。<sup>21</sup>

與此關連的是中日兩國風俗習慣頗多相似，使留學生在生活上較易適應。

也有以兩國距離較近為理由者。<sup>22</sup>留學生是國家未來的棟樑。在中國留學生中，也有當時身負重任的人。祖國一旦有事，可以立作歸計。因此，一衣帶水的日本，變成理想的留學國。

學費也有關係。比起西洋，日本的生活費便宜得多。根據匯兌行情，在中國國內學校就讀的費用，有時甚至可以足夠作留學日本之用。因此之故，在匯兌率有利中國的時候，留學生變得特別多。

18 張之洞：〈遊學〉，《勸學篇》外篇（1898 年刊），頁 6。

19 張之洞：〈廣譯〉，《勸學篇》外篇，頁 14。

20 〈遊學〉，《勸學篇》外篇，頁 6。

21 梁啟超：《飲冰室文集類編》上（東京：河邊半五郎發行，1904 年），頁 78。

22 張之洞：「至遊學之國，西洋不如東洋。一、路近省費，可多遣。一、去華近，易考察……」見〈遊學〉，《勸學篇》外篇，頁 6。